

抗战时期海外青年华侨 奔赴延安的历史考察

蒋国栋^a，王一鑫^b

(中央团校 a.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b. 中共党史与青运史系，北京 100089)

摘要：抗战时期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独特历史现象。在民族危亡与抗战烽火交织的历史背景下，一批海外青年华侨受爱国情怀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突破重重阻碍奔赴延安。他们克服生活适应、环境融入等挑战，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实现革命淬炼和思想蜕变，完成从爱国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身份转型，在宣传抗战、促进边区经济建设、对外联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海外青年华侨；延安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5409 (2025) 11-0029-05

DOI：10.26979/j.cnki.cn23-1524/f.2025.11.005

抗战时期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历史现象，是中共党史与抗战史、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的“群”面研究在学界得以展开，并产出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然而聚焦海外青年华侨这一特殊群体的专题研究，除《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1987年)、《峥嵘岁月——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纪实》(1988年)等史料文献出版以外，学术成果鲜少。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后，海外青年华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华侨通过捐款捐物、抵制日货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更有一批热血青年华侨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选择不远万里回国参战，汇聚成抗战时期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军。其中就有许多青年华侨突破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边区建设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系统考察这一特殊青年群体奔赴延安的历史动机、现实挑战、成长历程及历史贡献，以期展现海外青年华侨在抗战中的独特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内涵，为当前加强海内外青年团结奋斗提供借鉴经验。

一、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历史背景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长期居住于海外的华侨就已经有1200多万人，在民族危亡与抗战烽火交织的历史背景下，一大批心怀家国的海外青年华侨毅然奔赴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既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洪流的缩影，也是海外青年华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投身抗战的生动体现。

(一) 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方针，同时第一次将侨务工作写进了中央文件，强调“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呼吁“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1]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25日，延安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建立包括爱国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赞扬海外华侨的爱国举动，宣告采取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1936年，由朱德领导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小组成立，专门负责

收稿日期：2025-08-20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民族复兴语境下厚植海外华侨青少年爱国精神研究”(22TZTSKC013)；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建设一般项目“共青团干部党史学习的困惑、需求及对策建议”(666170304)

作者简介：蒋国栋，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共党史与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研究；王一鑫，硕士研究生，从事近现代历史及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研究。

处理与海外侨胞相关的工作。自此，基本奠定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待海外华侨工作的基调。

与此同时，共青团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联合起来”，并强调“与一切爱国同胞实行亲密团结，共同奋斗！”“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2]。这则宣言成为建立青年统一战线的先声。

当时，许多留学南洋的青年华侨常常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感受，“他们虽远居异地，绝不会一刻忘了祖国，相反地正因为他们远居异地，时受外人的欺侮与嘲笑，因此希望祖国强盛的欲念，更要来得急切，对于救国的事业也更加来得努力”^[3]。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组织对海外青年华侨的关注、支持和保护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使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海外青年华侨选择回国，纷纷投入抗战行列。1938年，抗战华侨社出版期刊《抗战华侨》，在创刊宣言中呼吁每个侨胞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是“巩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4]。青年华侨们的抗日救国热情被点燃起来，“大家深感：只要抗战，中国就有希望，只要抗战，民族就能复兴”^{[5] 23}。

（二）海外青年华侨的信仰选择

海外青年华侨对抗战的热情蔓延开来，起初他们在海外组织开展献金抗战运动、献身抗战运动、抵制敌货与制裁奸商等一系列的抗敌运动。然而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有些青年出现了过激行为，试图利用单纯的暴力行为将国仇家恨发泄到普通人身。事后他们反思，认为仅有一腔热血还不够，必须有明确的革命方向。

这时，国内掀起了爱国青年奔赴陕北寻求抗日救国真理的热潮，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回到祖国怀抱的青年华侨。他们大多在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地求学，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为了寻求正确的抗日救国道路，他们怀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踏上了前往革命熔炉的漫漫征途。国内爱国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6]的壮志鼓舞着海外青年华侨，一时间，“到延安去！”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选择。据当时奔赴延安的青年华侨所述，他们之所以选择去延安，“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5] 49}。

值得关注的是，受青年华侨选择回国、奔赴延

安的报国之情的感染，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成立的革命团体，以壮大力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例如1938年2月抵达延安的“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他们大多是来自南洋各地进步报馆的记者，怀揣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真相的执着追求，记录下战争的残酷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将前线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国内外的同胞，让更多人了解抗战的艰辛；同年11月到达延安的“马来亚机工服务团”则是一支技术型的革命队伍，他们大多掌握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关键技能。在抗战期间，他们承担起运输物资、保障后勤的艰巨任务。这些青年华侨团体抵达延安后，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热情欢迎，对他们的爱国情怀、宣传抗战政策、开展抗战保障服务工作等给予高度赞扬。

二、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挑战

抗战时期海外青年华侨选择回国并奔赴延安，既是一次爱国壮举，也是一段充满艰险的历程。他们要面对重重阻碍，如财力与身份的困境、国民党的阻挠与封锁、战乱导致的交通中断等。尽管困难重重，但在青年华侨坚定信念的驱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协作下，为海外青年华侨共同铺就了一条“延安之路”。探究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青年华侨的坚定信念，也揭示了抗战时期国内外进步力量如何协作，共同铺就了一条“延安之路”。

海外青年华侨决定去往延安之时，面临众多挑战，怎样解决钱财、家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生活环境发生的改变，要采取怎样的方式路线去往延安，这些都成为当时阻挠青年华侨们回国的重要挑战。财力是摆在海外青年华侨面前的一道困境。他们有的本身在海外处境状况比较贫苦，回国经费自然成为问题。有的虽然家庭条件优渥，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越条件。泰国出生长大的王耀华，19岁就在曼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泰国华侨抗日救国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曼谷地下组织决定输送青年华侨回国参与抗战。王耀华主动请缨，与其他七名党员一起去往延安抗大学习。为了保守秘密，这些党员的行动甚至不能向自己的家人透露。尽管王耀华父亲做生意，家境优渥，但出于保密不能透露机密，经费成为难题。王耀华通过打工等方式，花了很大精力才凑齐路费。除了经费，他们还要面临生死关、气候关、生活关、走路关等重重困难，仅凭一时热情坚持不下去，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黄耀环一一找到他们谈话，提醒作好思想准备。他们却坚定地说：“即使日后的路再有多么艰难，我也不怕，哪怕是流血牺牲，奔赴抗日的决心决不改变。”^[7]

受国民党实行封锁以及战乱导致的交通中断等

因素的影响，怎么顺利到达延安是摆在海外青年华侨面前的另一道困境。他们有的借助于海外侨团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秘密入境，有的以记者、学生等身份辗转香港、重庆等地迂回北上，还有的则直接参加抗日队伍，在战火中寻找通往革命圣地的道路。在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路途上，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办事处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外青年华侨们大多通过水路先到达香港，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和介绍下，前往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办事处的分配下去往陕北地区，奔赴延安。由于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交通不便，只能采用徒步的方式走到延安。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推动下成立于1938年，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廖承志和潘汉年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专门设立了交通和侨务的部门，主要承担接受爱国华侨的捐款和物资、对海外华侨宣传联络等工作^[8]。在海外青年奔赴延安的途中，第一站大多抵达香港，因此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不仅成为保障这些追求理想的年轻人们安全的“歇脚处”，也成为指引介绍他们去往延安的“中转站”。香港八办的工作人员总是热情地接待这些远道而来的青年华侨，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他们离开时，廖承志等人还会给他们开好介绍信、买好船票车票，说清楚后面的行程路线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且尽可能安排专人护送他们。

除了香港，海外青年华侨的另一处重要的落脚地就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尽管只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0月存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是成为与延安和抗日敌后根据地联络的重要中心，仅1938年5—8月，就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爱国青年800余人。著名的华侨记者黄薇，在参加徐州会战的战地报道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安排下，跟随世界学联代表团奔赴延安参观访问。出生于华侨家庭的邓旭初在1938年5月从广州奔赴陕北，他们一行人首先搭乘火车到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稍作停顿并且询问去陕北的路线。当时，国民党军为了阻碍日军向郑州进犯，炸开黄河大堤，造成河南一带发生水灾，邓旭初一行人只能沿着公路步行前往，“途中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洪汹涌，土匪四伏，多次遭遇生命危险而幸免”^[9]，最终历经20多天才到达西安。

到达延安之前的最后一站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青年华侨大多经过这里转赴延安。由于工作繁忙，负责人伍云甫常常亲自坐在办事处门口，接待一批批想要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从西安到延安，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黄土高坡山路绵延，因此只

能步行前往。800多里路程，地理环境恶劣，常有野狼出没，生活条件艰苦，同时还要面对国民党军设置的重重关卡，这些都阻挡不了想要奔赴延安的青年华侨们的热情。

在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香港、武汉、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接待、指引、物资保障以及精神支持。这些八路军办事处不仅确保了青年华侨在艰难旅途中的人身安全，而且通过宣传和动员，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投身抗日救国事业的决心。

三、海外青年华侨在延安的革命淬炼

对于来到延安的海外青年华侨而言，虽怀揣报国之志，但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他们的培养，绝大多数青年华侨抵达延安后，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学习。经过系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专业技能培养后，根据个人特长与革命需要，被分配到各条战线从事革命工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党中央还着力加强青年华侨的组织建设，先后成立华侨联谊会、华侨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将分散的青年华侨凝聚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青年华侨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也为抗战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学习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等二十几所院校。许多青年华侨到达延安后，被安排进入各个学校进行学习，其中，陕北公学是拥有最多华侨学生的学校。在陕北公学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惯了大米饭的青年华侨一开始很难适应陕北的小米和馒头，许多从热带地区来的华侨学生更是受不了陕北刺骨寒冷的冬天。据当时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李介夫回忆：“我们这批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有的过去生活在有万贯家财的家庭中，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在陕公学习，我们能够和国内的青年一道，住窑洞，吃小米，过着艰苦的生活，坚持学习下来，并逐步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高昂的爱国热情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学校受到了党的教育，学员们逐渐树立了一个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思想。”^{[5] [9]}抗战开始后最早一批投奔延安的菲律宾青年华侨——杨志民等六人被称为“开路先锋”，他们都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杨志民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还帮助

后到延安的青年华侨施纯亮等人熟悉延安的学习生活，向他们介绍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和学习方法。对于“开路先锋”这一称呼，杨志民纠正道：“真正的开路先锋，是共产党，我们是党指挥下的战士。在菲律宾时，我就相信，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的，一定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华侨，决不只是我们几个人。”^[10]从他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让这些青年华侨彻底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加深，大多数人在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些青年华侨而言，此前最熟悉和了解的当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来西亚华侨黄炜然就讲述自己和同学们在吉隆坡的华人学校，经常能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在报纸上就整版刊载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吸引许多青年华侨产生了向往^[11]。青年华侨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仅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学习军事知识，包括军事战略、游击战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菲律宾华侨白刃回忆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课程中，还包括有机化学这一科目，是由于当时日军大搞毒气战，因此专门培养了解毒瓦斯的种类、性能、化学成分以及防毒知识的专业型人才。抗日军政大学还常常带领青年华侨们参加生产劳动，不断提升各方面素养。

为了发挥青年华侨自身优势，培养党的青年干部，还有一部分青年华侨到达延安后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学习。菲律宾华侨庄焰回国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了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回忆自己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经常能够有机会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大大提升自己的马列主义修养。中共中央党校的很多学习课程，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具有丰富而生动的现实事例，对青年华侨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他们还时常与参加红军、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学及学校领导交流学习，获取了很多实际斗争的经验。在国民党的封锁阻碍下，学生们在中央党校的生活非常艰苦，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参与到生产开荒运动，进出山沟里背木柴以抵御寒冬，青年华侨们不怕苦不怕累，学习、继承并发扬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青年华侨们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深入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他们在这片革命热土上经历了物质生活的艰苦考验，获得了精神世界的成长。这批热血青年华侨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蜕变，成长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力量。

（二）组织建设

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爱国华侨纷纷支援抗战，在各地成立了华侨联合会等组织，为了进行统一联络和管理，1937年7月，华侨留延办事处成立。1938年7月，陕北公学旬邑分校成立，其中，华侨学生超过一百人；同年年底，在陕北公学成立了华侨联谊会，印度尼西亚华侨张然和（又名张国坚）担任主任，泰国华侨朱瘦林任副主任，新加坡华侨廖冰任秘书长，这也是陕甘宁边区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华侨联谊会一方面积极团结从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华侨，帮助他们适应延安的生活，融入革命队伍；另一方面，经常利用陕北公学等学校资源，举办针对青年华侨的讲座，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政策，鼓励青年华侨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投身革命。在华侨联谊会的积极引领下，大批进步青年华侨经过革命实践的锤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输送了新鲜血液和优秀人才。虽然该组织仅存续半年左右，但既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华侨联合组织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探索团结海外侨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延安地区的海外青年华侨群体中，南洋青年华侨人数较多，为了加强在延安期间的联系，1939年7月，成立了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1940年3月，新加坡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归国对抗战情况进行考察。陈嘉庚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在抗战期间他组织建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主席，积极动员爱国华侨向国内捐款、捐献物资，并且帮助选派技术人员回国进行抗战服务。他一直十分关心国内抗战形势，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6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陈嘉庚。当时，两位南洋学生也应邀参加，他们能随意进出毛泽东的办公室并且不需要多余礼节，没有拘束地与毛泽东交谈。陈嘉庚切实感受到共产党没有官僚作风，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平易近人。交谈完，毛泽东跟他们一起吃了当地陕北人的农家饭，使陈嘉庚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民风热情淳朴。考察团参观了延安的工厂、学校等单位，并与在当地学习、生活的青年华侨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对青年华侨的培养和重视。

为了筹办规模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华侨革命团体，边区政府委派余光生等人考察延安华侨状况。并于1940年9月5日，由华侨留延办事处发起，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南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名华侨以及留在延安学习、工作的300多名归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选举产生了李介

夫、谢生、冯志坚、余震和杨诚等 5 名执委，李介夫为主任。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加强了与海外侨胞的密切联系，有效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更将青年华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有组织的革命实践。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积极引导华侨青年投身边区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宣传工作，使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系统性。

四、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的历史贡献

在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海外青年华侨在民族危亡之际与祖国同频共振，他们怀揣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冲破重重阻碍，汇聚于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他们接受革命洗礼，学习先进理论，锤炼坚强意志，他们以自身热血与学识投身抗战宣传、医疗卫生、军工业生产、文化教育等领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

一方面，成为站在抗日救亡与抗战宣传最前线的先锋力量。青年华侨奔赴延安后，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力量。他们有的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有的在后方开展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青年华侨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事迹，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青年华侨在延安学习革命理论后也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向华侨群体宣传，扩大了革

命思想在海外的影响力，为海外华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提供了重要渠道。许多青年华侨还积极参与延安的文化教育工作，如创办报刊、撰写文章、演出文艺节目等，为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推动革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成为侨务工作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青年华侨在延安期间参与创建了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等侨务组织，为团结青年华侨、开展侨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组织成为中共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和纽带，为新中国成立后侨联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些组织建设的引领下，青年华侨根据自身特长，积极参与边区的经济建设。他们有的进入工厂、合作社，从事生产劳动，为改善边区的物资供应、发展边区经济贡献了力量；有的利用海外关系，为边区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海外青年华侨奔赴延安不仅是一段值得铭记的红色记忆，而且为新时代侨务工作与青年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刻启示。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些华侨青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以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投身中国革命，彰显了海外中华儿女与祖国血浓于水的精神纽带。他们的选择深刻阐释了爱国主义始终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念、政策主张与组织能力则是凝聚侨心、汇聚侨力的关键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段历史对当前加强海内外青年交流、完善侨务政策、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12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7.
- [3] 蔡仁龙,郭梁. 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M]. 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133.
- [4] 励予. 侨胞在抗战中的任务[N]. 抗战华侨,1938-03-11(1).
- [5]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 编. 峥嵘岁月——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纪实[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6]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98.
- [7] 郝雪廷. 国际友人与爱国华侨在武乡[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91.
- [8]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1)[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24-225.
- [9]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红色故事我来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93.
- [10] 《泉州华侨史料》编委会 编. 泉州华侨史料 第 2 辑[M]. 泉州: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市侨务办公室,1985:121.
- [11] 黄玲. 深圳党史资料新编[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376.

[责任编辑：解洪兴]